

# 新中国70年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

张翠<sup>1</sup>, 施千帆<sup>2</sup>

(1.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辽宁 锦州 121000; 2.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1949年以来, 中国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以其体式优势成为最繁盛的文类, 涌现了大量兼顾艺术探索和叙事传统的佳作, 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新中国壮丽的70年历程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基础性动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篇小说一直在艺术品质上高位运行, 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与时代共享的价值特征和审美诉求, 涉及城乡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以微处洞烛潮流, 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体现了中篇小说这一文体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无数个中国故事的书写, 在文学的向度上把握和表达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关键词:** 中篇小说; 国家形象; 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日常世俗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17(2020)01-0021-08

中篇小说容量较大却不放纵, 依赖经验却又弹性十足, 适宜的长度却能抵达想要去的深度和广度, 以其体式优势受到刊物青睐和读者喜欢。从1949年到2019年,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70年中篇小说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之歌。无数个有质地、有温度的故事展现出中国大地上丰饶的情感和生活, 表达出新中国的梦想与激情、曲折与前进、柔软与力量、艰难与宏伟, 国家形象在文化的维度上被塑造、承载和传播。

七十年, 沧桑巨变, 风雨兼程。70年来, 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 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 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 经历了从新生到成长再到强大的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 一时期有一时期之文学。文学作为社会历史的镜子, 它不仅能够映射历史的发展, 反映现实与人性, 同时还能照出未来的方向。

新中国70年文学的建构、发展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互呼应, 形成了两条彼此相互参照的平行线, 两条线中间的部分由国家形象所联结, 历史悠久、勤劳智慧、充满改革活力和东方魅力的大国形象隐约出现却又无时不在。

中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体式, 一般我们会把鲁迅的《阿Q正传》视为第一部现代中篇小说, 之后有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中篇小说。但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来看, 当代中篇小说的发展期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经历了“文革”时期,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以及新世纪中获得了稳定的生长空间, 不断崛起、壮大、繁荣。而在不同阶段, 小说所传达的社会和文学信息

收稿日期: 2019-11-02

作者简介: 张翠(1969-), 女, 辽宁锦州人, 教授,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研究。

不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展示也有不同。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篇小说一直在艺术品质上高位运行,景象繁荣,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与时代共享的价值特征和审美诉求,涉及城乡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微处洞烛潮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体现了中篇小说这一文体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无数个中国故事的书写,在文学的向度上把握和表达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塑造。

文学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可知可感,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文字的细节性观照能力,也在于文本的可深度性挖掘能力;不仅是对象性的,同时也是主体性的。出于对新中国母体的体认,在文学中书写“我”“我城”“我家”“我国”,表达着一种由“家”到“国”的家国同构情怀。与中篇小说互为参照的过程中,国家形象随着国家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十七年”文学,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新形象树立在世人面前;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足音,国家形象在文学中又迸发了新的生命力;直至21世纪,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整个文学也呈现出新的态势。“时间开始了”,在新中国时间里,中篇小说文体内部也在生长、变化、精进、成熟,在不断追求精神审美的新高度中,东方大国形象于其中呼之欲出。

### 1. 社会主义形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新中国不同以往,不是君主立宪制,不是旧民主主义,也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经济,开启了建设。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形象,主要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国家形象,这些作品通过展现新中国的建设,以此展现一个新的形象。《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年中篇小说集》里,共选编了27部中篇小说,我们可以视其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篇小说的代表作。

现代工业题材作品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等,反映了在建设力量和建设资金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干部、工人的劳动生活以及新旧意识的冲突。农村题材作品孙犁《铁木前传》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蕴含了新中国的人情美、人性美。柳青的《狠透铁》写出了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中,新社会形态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博弈,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新旧之间有种种对抗,但作家对故事的发展做了乐观性处理和理想化展望。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新人,新中国需要新国民,而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新国民的代表,也是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个体层面上的体现。

这样一来,对新国民的培养势必会产生对新的国民精神或是国民性的培养。“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sup>[1]</sup>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兴起,人们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在触手可及的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焦点,新的国家形象就此诞生。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新中国,是一个以社会关系公有化和生产现代化为标志的新中国。“这种中国形象得以组织起来基于如下一个基本信念: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想象的就应是现实的。新的公有化和现代化时代是如此地使人充满信心和希望,以致普遍地相信很快就能在满目

疮痍的废墟上‘变’出一个合乎想象的无比美好的‘中国’。”<sup>[2]</sup>无论有多少欢乐与悲伤,艰难与困苦,矛盾与冲突,勤劳勇敢、朝气蓬勃、热情友善、富有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体现在“十七年”中篇小说中新中国国民的形象。因此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对新国民性的重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社会主义新形象。

还有一些作品是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情境,歌颂两国人民的友谊,表现抗美援朝战斗生活如陆柱国的《上甘岭》、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陆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始终提醒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历史。

## 2. 改革开放形象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程上重要的历史节点,而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正是从此开始形成和构铸的。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开放程度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而不断升华,在改革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各阶层、各方面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篇小说,对“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多方面的,起初是呼唤和想象中国改革开放,关注改革与保守之间的冲突,多方面探索改革遭遇阻碍的原因,如思想、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这一阶段的中篇小说很大一部分都是反映改革生活对人们的影响,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揭示了社会进步的宏伟前景,传递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凸显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特征。

在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

此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正面塑造时代英雄、鼓舞民众信心的同时,作家们在作品中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存在的种种弊端予以及时、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从社会弊病和缺失中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湛容发表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就是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诞生的。小说塑造了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的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呼吁改善科技人才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关注知识分子断代问题。这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社会问题的文学担当,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激发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文学为改革推波助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呼声,引发整个社会的反思,合力形成改革的思潮。

路遥的《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叙写了城与乡存在二元对立、新与旧处于变迁的特殊时代境遇中高加林们的生活场景、奋斗图景与精神困境,揭示了中国人生存处境和“精神性气候”,呼唤改革社会现状的责任和担承。高加林强烈渴望进入城市生活而辜负了真心爱她的农村姑娘巧珍,但高加林的形象兼顾了坚强、韧性和活力,在奔向远大前程的路上,即使狠狠绊倒也能迅速爬起来。无论怎样,国家的改革开放让广大平凡而普通的年轻人看到前景和希望,让亿万国民爆发出强大的奋斗力量。

工人出身的小说家李铁擅写中篇,他在创作谈《面对熟悉的环境》中说:“我伙在一大群工人当中,目睹了新时期以来工厂的变化,企业承包、改制、与外商合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竞争上岗……”大江大河般的改革进程中,许多工人成为国企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命运承担者,如《乔师傅的手艺》等作品。中国工人面对改革与转型有迷茫,更有工人阶级的使命感和国家荣誉感,像《我们的负荷》中的主人公孙兆伟拒绝权力诱惑,在国内企业与外商的合



资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的资产评估值,挺身而出,大胆提出发电机组达标试验的建议,通过技改、抢修和调试,使原本常年不达标的机组达标,让外商提高了投资额,为国家赢得了利益。

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它持续了40年并仍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是国家的伟业,也是亿万国人共同的事业,更是国家的光辉形象。只不过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它显得尤为突出,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的不断清醒,关于改革开放的文学叙事也在不断地丰富,因而与此相对应的国家形象也就不断在更新变化,将愈来愈呈现出更加开放、更具亲和力、更加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大国形象。

### 3. 维护主权形象

军旅评论家朱向前曾有一篇文章叫《中篇合为时而著》,他认为新中国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是在八十年代,1982年,中国文坛问世了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

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一批热血青年经过自卫反击战的战火洗礼,锤炼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军魂群像。雄浑悲壮的故事、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饱满丰富的情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宽阔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使这部中篇具备了经典的品质。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几位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以其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感动和净化了一代人的心灵。这部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军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宣示出中国为维护主权敢于亮剑的国家形象。

韩静霆《战争,让女人走开》展现的是部队开赴前线前夕,刚到部队来共度春节的军嫂们悲喜两重天的情感。朱苏进的《射天狼》、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等作品都是反映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风貌。我们

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文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是想象与现实二者相互统一的。同样是写军事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20世纪80年代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就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在建国初期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后者敢于正视现实,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也深刻反映出部队中的某些现实问题,有家国情怀的坦荡洋溢,也有尖锐的批判,比如朱苏进《射天狼》极富艺术个性,刻画了和平年代军旅人物的光荣与梦想、无奈与痛楚,呈现出军营里或明或暗的人际纠结、人欲物欲。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忠实于生活,勇于直面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开掘生活的真理之路。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文学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需要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缩短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以丰沛的文学想象创作、反映更真实的国家,使文艺作品更加贴近大地和大地上人民的生活实际。

### 4. 日常世俗形象

日常世俗的国家形象其实可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另一幅面相。世俗化,在马克思·韦伯的话语体系中指“祛魅”,即去除宗教神圣性的过程,宗教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逐渐退回到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用在本文的语境中指的是国家形象的“去政治化”过程。当代中国曾经高度政治化,政治无处不在,充斥着文学的各个角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由“政治中国”向“经济中国”转型,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及国家权力不再全面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了相对明晰的分界线,国民的个人精神需要、物质欲求等世俗欲望都得到了肯定,而世俗日常生活具有了现实的“此在”意义。

1982年,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发表,这部被誉为世情小说、文化小说的作品使中国当代小说出现了新的叙事方向,拉近了文学与世俗生活的

距离,显示了日常生活在社会历史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本体性价值。这是八十年代很值得关注的一部中篇,它拓宽了文学的疆域,开启了文学中呈现日常世俗中国的意义。

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体国民情绪由浪漫、激情转为务实、平实。方方的经典中篇《风景》及池莉的《烦恼人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1987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日趋繁荣,文学关注焦点的转移使中篇小说中的重心发生相应的下移——进入世俗而繁琐的生活情境,对个人的情感把握更加细腻深邃。当代中篇小说也开始重视对日常生活和寻常人物的非典型化书写,在这种特定时代下的世俗书写中,人被还原为人,文学也更加体现出人学的特征。以新写实小说(如刘震云《一地鸡毛》)为例,在“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作家的叙事从“社会化”转向“私人化”,崇尚“零度叙事”,以这种方式消解精英与平民的差异,而这其中也展示了一种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叙事美学和生活哲学,展现了一幅独特的有烟火气的世俗画卷。

进入21世纪以后,中篇小说异彩纷呈,缤纷炫目,呈现出现实主义特征突出、艺术表现方式多样化创新化、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女性作家等特征,作家们对中篇小说容量开掘和艺术指向自觉探索,形成并巩固了它的审美优势。题材上也有了更加深入时代肌理和生活褶皱的变化:对工人、三农的强烈关注,如曹征路的《那儿》、李铁《点灯》、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葛水平的《喊山》等;对女性命运、城市欲望的书写,如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毕飞宇的《青衣》《玉米》、赵玫《一切如此寂静》、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宋唯唯的《月如荞麦花如雪》、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尹学芸《天堂向左》等;对官场现形日常的关注,如周文的《太阳黑子》、梁晓声的《民选》、孙春平的《鹏翼徘徊》、陈世旭的《救灾记》、张力《换个环境》、尤凤伟《排异》等;底层叙事的疼痛与诗意,如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刘

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安勇《我们的悲悯》、王跃文《漫水》等;高校知识分子灰色灵魂的曝光,如张者《桃李》;还有写异质文化空间里移民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抒写乡愁,如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

呈现这一国家形象的当代中篇小说,注重表现平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和普通人的琐碎生活,描绘个体命运中的历史感,为世人呈现了一幅幅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的活泼的生存现实。这些描述国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将国民的追求、梦想、欲望、奋斗,婚丧嫁娶、悲欢离合、成功失败、生老病死等世俗生活和情感一一呈现出来,写出日常生活和人间烟火中的温暖与力量,出现了一种积极正面的日常世俗的现代中国形象。

### 5. 环保生态形象

在当代最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呈现一种美丽中国的形象期待与强烈吁求,这也是生态文学一直注视并践行的方向。当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忧思关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倡导与研究也成为文学为美丽中国的呈现而贡献的理论支持。这里环保生态形象是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呈现出的努力建设优美、宜居、青山绿水的中国生态形象。

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生态文学一直关注的问题是,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消费主义行为,因此一些以关注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当代中篇小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王松的《双驴记》以知青运动为创作背景,以驴性写人性,通过知青马杰和两头驴之间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争斗过程,间接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具化为人与驴的斗争冲突。小说“用一种焦虑的,拟人的方式来展开叙事,从而在一系列斗争过程中凸显寓言与象征意义。揭露出人类蔑视自然、疯狂掠夺自然的恶行必然导致人类被相应的惩罚”。“人类受到自

自然界惩罚这种必然结果的责任在于人类本身,人类只有和动物、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走出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sup>[3]</sup>周建新的《斑海豹》面向大海,沉思大海,表达了对海洋环境恶化的忧虑。李铁《护林员的女人》关注人与自然的亲密伦理。苏兰朵《白熊》虽说是科幻题材,也涉及到环保主题,充满了反思的力量。阿来的《已经消失的森林》中,描写了村子四周的山峦几乎完全光秃秃的场景,山坡上裸露出灰黄的泥土与灰白的岩石,四处是泥石流冲刷过的痕迹,童年记忆中的森林,以及众多的溪流如今都消失了。阿来2018年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的深切关怀,小说表达了对藏区那泛着怡人绿色、天人合一的“原生态”生态文明的追求与向往,阐扬了生态平衡的迷人魅力。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通过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衡状态,表达了作家对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强烈期望。在他的中篇《豹子最后的舞蹈》中,豹子孤独地行走在神农架的山中,近乎没有它赖以生存的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股无法言说的绝望之情。上述小说题目中的“消失的”“最后的”等字眼,无一不在暗示着现代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和破坏,也藉此以唤醒人们对其他生命的关注与求索。

对环境问题的书写,恰恰从另一个维度折射出作家们深远的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彰显着作家们对建设青山绿水、山河秀美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底气。

## 二

文学源于生活,而文学形象是经由语言形象化了的生活。相对应的,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国家形象的本质也应该是生活,甚至就是生活本身。“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时代风貌,生活民情,具有一个时期所应有的特殊性和使命感。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也不是一个“瞬间性”的事情,是一个富有历

史感延续性的进程,“中国形象体系是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与‘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出的多元化样态。”它应当站在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整体的、审美的、想象的等各个层面,它更应该是对当下的反思与再认识。

如何去认识历史,如何去看待一个国家,如何去思考一个时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小说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故事作为国家形象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建构方式,能够比较直观地展现国家形象,同时,这也常常是一种比较富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感的表现方式,涉及的层面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还有每个人波涛汹涌的内心。文学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凸显其特征,展现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与民族心理变迁史的动态变化过程。“文章合为时而著”,当代文学中之所以会有不同时期国家形象的呈现,就是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作家都在当下进行着思考,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痛定思痛,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万至十万字的中篇适宜适时地表达了作家们的思考。他们在从事一种“活”的写作,努力表达着自己对国家的情感,同胞的情感,对人和人生的情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伟大的、神圣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被逐步建立起来,并逐渐趋于定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浪潮,这种新的创作浪潮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第五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使上述中国形象创造虽然达到高潮,却又必然地走向消解。这次中国形象浪潮的潜流已经隐伏在80年代前期文学中了。”<sup>[2]</sup>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也呈现了此起彼伏的样式,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寻根文学”的兴起,出现了一批作家,王安忆的中篇三部曲《小鲍庄》《逐鹿中街》《叔叔的故事》、韩少功《爸爸爸》、阿



城《棋王》》可以作为代表。之后,还有“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先锋小说”作家马原、王蒙、洪峰、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在传达时代气息上有着独特的魅力,她仅以这部中篇就成为一位不被人们遗忘的重要的作家。八九十年代之交,还有一位不可被忽视的作家王朔,他难以被归类但在文学创作上却颇具冲击力,以《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大量中篇小说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王朔的创作中几乎都是中篇小说,他彻底和纯粹地立足于社会变革之中新的社会现实。这一阶段,中国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文学站出来参与了消解假大空式的崇高,而且已经明显地出现个性化写作的倾向,使得整个国家形象在个性化与固定化之间游走,使得本世纪国家形象的传统在全面复现的同时又走向消解。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正主流化语言和精英化语言被解构,出现了很多种个性化语言喧嚣的场面,如王蒙的立体语言、贾平凹的白描式语言、王朔的自我嘲讽与社会调侃式语言、于坚的口语式语言。其次,在国家形象方面,尤其是在家族形象的塑造方面所显示出的传统经营的根基受到“新人”的挑战甚至是取而代之,如莫言的《红高粱》,作家从“民间身份”叙述了一个民间中国,塑造了源于民间,生命力旺盛、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传奇人物,“个人生命”迸射出灿烂的辉煌,既是民间情怀的言说,又有反叛传统的现代意义。再次,在世俗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市民形象以取代精英的形象典型,从微观的层面揭示国家形象的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过渡与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人们对日常生活更加关注,涌动着一种“市民写作”“私人化写作”的风潮,对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人物的描写,消解了精英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差异。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变化飞跃,旧有的传统在飞速退去,新的气息在不断流转;另一方面随着世纪末的到

来,人们的心头笼罩着一丝苍茫的情绪,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体现在精神上迷茫和疲软,缺乏精神承担和责任。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精神危机”的影响,普遍有一种“不在家园感”;同时受到媒体浪潮和网络文学冲击,纯文学日益边缘化。如果说先锋作家不断地通过强化技巧、形式来逃避现实,那么90年代初的作家便是在文学层面上身体力行地完成了对精神的淡化与放逐。但也有一些中篇小说坚守精神家园,围绕精神书写展开对伦理爱情的思考,如阎连科的《黄金洞》、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如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在21世纪初的中篇小说中,这种个性化写作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个人的生活范围内关注个人,而且在关注现实、探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展开了对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当代新世纪小说家们的不断探索和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其为“整体意义上的悲悯情怀”。新世纪的小说家们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孜孜不倦的探索,在取材上也别出新意,在思想上也别出新境,在把握文学性内核上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如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蒋韵《行走的年代》、马晓丽《云端》、方方《琴断口》、裘山山《花香催人老》、鲁敏《逝者的恩泽》、乔叶《巨角》、格非《隐身衣》、老藤《青山在》、徐则臣《逆时针》、石一枫《地球之眼》、孙频《鱼吻》、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王十月《不断说话》等作品。

作品中的国家形象有很大一部分要素是关于形象的呈现,这就涉及一个关于想象与现实相统一的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想象,这也是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特殊性,文学是具有丰富想象性色彩的艺术形式,而它的本质也在于此,文学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具有想象的色彩与质地,换一种说法,“国家形象体现或满足了不

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不同文化想象。”<sup>[4]</sup>正是文学和国家形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国家形象才得以以各种面貌出现。

### 三

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中篇小说虽没有长篇小说成就高,但由于刊情因素和读者因素,却是最为繁盛的一个文类,涌现了大量兼顾艺术探索和叙事传统的佳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新中国壮丽的70年历程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繁盛的经验、广阔的题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分化裂变、社会形态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奔腾不息,为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创作提供着基础性动力,作家希望在作品中全景展示社会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同时体现出自己的批判立场、情感温度,而最能抵达这一愿景、符合这一标准的文学样式,显然非中篇小说莫属。中篇小说整体上实现了对社会现实、时代风云

的多视角无缝呈现,对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各种公共话题都进行了广泛关注,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之现实境遇和精神空间都在作品中得到全面展示。万万千千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中国故事是中国人的生活、命运,是中国人的性格、心象,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精神密码,或直接或间接地映现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和谐文明、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和魅力的东方大国形象。

相信中篇小说会在新时代语境下以人民为中心,扎根现实,叙写当下,萃取出真正凝聚时代本质的中国故事,使国家形象在新时代迸发新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史》史料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 [2] 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东方丛刊,1997(1,2):7-29.
- [3] 陈南先.回望与前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 [4] 张玉勤.当代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J].江海学刊,2013(4):179-185.

## Country's Image Study of Chinese Novella in 70 Years

ZHANG Cui<sup>a</sup>, SHI Qian-fan<sup>b</sup>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zhou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Jinzhou 121000, China;

b.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1949, the novella i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advantage of its distinctive type has become the most prosperous literature genre and has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of masterpieces including numbers of classical works which explor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In seventy years, the splendid history of China provides fundamental impetus for writers' creation. Especially behi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novella is always developing in a high-level of artistic quality. It shows characteristics of value and aesthetic requirements which are shared with contemporary in content and form, and also it relates to all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counties in details printed deeply the imprint of times. All of them show that novella is capable of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ontemporary life. Numerous stories of China written on the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represent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of new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module and propagate the country's image.

**Keywords:** novella; country's image; socialism; reform and opening-up; secular life

(责任编辑 伯 灵 校对 伊人凤)